比较文学教学与学科理论建设

从外部来思考
——评 ACLA 2005 年新报告兼谈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张隆溪
(香港城市大学 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

摘要: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每 10 年发表一份报告,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现状作一个总结,同时探讨未来发展的路向。继 1995 年出版上一份报告之后,今年晚些时候即将出版由耶鲁大学教授苏源熙编写的最新报告,题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的比较文学"。2004 年 12 月,在美国语言学会(MLA)的年会上,一个特别小组讨论会邀请了 3 位学者对 ACLA 新的十年报告作出评论,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琳达·哈奇恩、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卡勒和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张隆溪。在张隆溪的评论中,他对于苏源熙所赞赏的更新"文学性"观念的认识表示认同,但他更强调了东西方比较研究的潜力。他认为,只要超越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将视野扩展到真正的全球性的范围,那么东西方比较研究势必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

关键词: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 2005 年新报告; 苏源熙; 东西方比较研究

Abstract: Every ten years,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ACLA) issues a report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at also explores potential areas of furthe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 last report was published in 1995 and the new ACLA report will be published later this year under the titl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edited by Haun Saussy of Yale University. In December 2004, a special panel was formed at the MLA meeting to

comment on the new ACLA report, and the three panelists are Linda Hutcheon of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Jonathan Culler of Cornell University, and Zhang Longxi of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Zhang's comment supports Saussy's recommendation of a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idea of "literariness", but with a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potential of East – West studies. He argues that East – West comparative studies will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cholarship by going beyond traditional Eurocentric concerns and by expanding our horizon to a truly global dimension.

Key words: ACLA; new report of 2005; Haun Saussy; East – West comparative studies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号:** A **文章编号:** 1006 – 6101(2005)04 – 0001 – 11

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成立于 1960 年,每十年责成一个委员会提交一份研究报告,对比较文学学科的现状作一个总结,同时探讨未来发展的路向。1993 年,ACLA 发表由查理·伯恩海默(Charles Bernheimer)负责撰写的一份报告,醒目的标题是《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1995 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从这份报告的题目就可以知道,多元文化主义以及相关的文学批评理论,构成了 80 年代到 90 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大背景。的确,在那十多年的时间里,理论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而且不仅在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就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其他一些领域,也很快成为研究是否有深度、是否有分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当然是超出单一文学传统的,从一开始就和比较文学研究有密切关系。在将来的文学研究中,理论仍然会继续起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批评理论的发展对比较文学本身有什么影响,又带来什么结果呢?比较文学未来的发展又将有些什么潜在可能和趋势呢?2003 年,ACLA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现在任教耶鲁大学的苏源熙(Haun Saussy)教授负责,起草新的十年报告。这份报告采取各抒己见的新形式,除苏源熙起草的报告之外,还有委员会其他成员写

的文章，加上一些回应，收集起来编为一集，题为《在一个全球化时代里的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Iobalization*)，不久仍将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印行。在美国语言学会(MLA)2004年年底于费城举行的年会上，ACLA有一个特别的小组讨论会，邀请了3位学者，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琳达·哈奇恩(Linda Hutcheon)，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还有从香港去参加此会的我对ACLA新的十年报告作出评论。我们三人的评论，也将收在报告书中出版。

苏源熙撰写的ACLA报告已经有部分被译成中文，接连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第4两期。这说明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们，对这份报告也相当重视。我在对这份报告的评论中，特别强调了东西方比较的意义，相信国内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对此也会有些兴趣。所以我决定把我的评论用中文重写出来，提供给国内的学者和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读者们参考。

自1998年以来，我已离开加州大学到香港任教，所以2004年圣诞前夕，我是从香港专程飞到纽约，然后再乘火车去费城，实实在在地飞越过了半个地球，从很远的东方到美国去评论ACLA的报告。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外来者，不是美国比较文学学界圈子里的人。我固然可能不如圈内人身在其中，了解内部动向，知道一些内部消息，可是我的评论也因此可以不大受圈内人眼光的局限。俗话说旁观者清，我或许可以声称自己是从外部来思考(penser d'un dehors)，能够看到圈内人囿于盲点看不到的地方。然而我知道，圈内人固然有盲点，外来者又何尝不会懵懂无知，二者不过半斤八两，不相上下，所以我绝不想自以为是，声称有什么独特的角度和见解。我可以说的不是外来者看得更清、思考得更明确，而只是外来者可以看得不同，思考得不一样，不遵循圈内人通常接受的那一套观点方法，因而可以比较独立而且带批判性地去思考。所以对我说来，所谓从外部去思考，其实就是采取一个不受限制的立场，敢于独立思考(ose penser de lui même)，绝不人云亦云，

更不追风赶气,盲从当下流行时髦、影响广泛的理论、观点和批判方法。

不过说来也巧,从外部来思考,或者说做出一副文化上他者的姿态,故意取一个所谓边缘的立场或周边的角度,似乎恰好在当下是十分流行而且时髦的。因此我作为一个外来者独立思考,首先就必须摒弃那其实占尽便宜的所谓外来者立场,拒绝那并非真诚的所谓他者的姿态。所以我虽然从外面到费城,固然不能算是一个圈内人,却也并不真是一个外来者。我看得很清楚,自己既非圈内,亦非圈外,其实是个介乎两者之间的人;而在我看来,介乎两者之间恰好正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人应处的位置。所以我也正是从这样一个位置,来对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新的十年报告,作出我的评论。

苏源熙的报告描述近十年比较文学的状况,认为理论的发展使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渗透到其他学科领域,可以说是比较文学的胜利;但与此同时,当英文系和其他人文学科都大讲理论、大讲跨学科的多媒体文化研究时,比较文学也就有丧失自己本身特性的危险。对美国大学人文科系的情形稍有了解的人,对此都会有相当体会。研究比较文学必须懂几种语言,又不断要求跨越国家民族的界限,所以比较文学在任何单一语言文学科系的专业领域里,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家园,也很难在那种领域的空间里,感觉得自由自在。韦勒克等人早已指出,比较文学定位的问题,或者说比较文学的危机,从一开始就和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联在一起。[①]这名称中第一个词——比较,并不能表述其性质,因为比较是做学问普遍使用的方法,并非比较文学的专利;而现在这名称中的第二个词——文学,也逐渐在丧失其中心地位,因而有损其性质。正如苏源熙所说,现在做一个理论语言学家,可以不必懂许多种语言,现在做一个文学研究者,也同样可以"以研究文学为业而无须持续不断地讨论文学作品"。文学研究中"比较的空间"大多是一种从其他学科借用过来的空间,包括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其结果相当危险,使比较文学几乎"丧失其自主性,成为应用其他学科的领域,而那个学科就在确定比较文学的性质"。比较文学渗透其他学科

的胜利只是一面,上述情形当然就是其另一面。然而离开文学本身,不再把文学作为注意的焦点,比较文学就会丧失其为文学研究的特性。因此对于比较文学在目前的状况,重要的任务的确如苏源熙所强调的那样,就是要重新考察“文学性”观念,以新的视角重返具有新意和新见解的文学研究。

现在许多文学研究者都纷纷转向研究电影、通俗文化和其他类似领域,大概是因为他们相信,只要披挂好批评理论上阵,就可以长驱直入侵入那些领域。无论什么研究对象,只要可以视为文本(text),或认为具有文本性(textuality),就都可以用那一套批评理论去解剖分析。而文学在他们看来,早已是被征服的领土,早已被各种批评理论反复分析过了,更不用说还有不少人认为,文学,尤其是前现代或早期现代的文学,都带有精英主义成分,政治上值得怀疑,说不定与权力有共谋的关系,表现压制性传统的保守价值;甚至如克里斯托弗·布莱德尔(Christopher Braider)颇为沮丧地指出那样,文学被视为“文化虚构和文化控制技术邪恶的实验室,而福柯最喜欢用来体现这种控制技术的偶像,就是霸权式的现代国家”。放弃文学,转向电影、多媒体、俗文化以及当代西方中产阶级城市生活方式的其他内容,也许如苏姗·巴斯奈特认为的那样,算得是“激进的主题选择”,而比较文学和传统的文学批评都“越来越被视为是来自自由派人文主义史前时代的恐龙”。[2]

这话也许不无道理,但这样做是否也有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尽量合理化的嫌疑呢?这是否也是一种自我中心的自恋,是玩弄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全然不顾或者完全忘记历史、去迁就迎合快餐文化的大众趣味呢?快餐文化使人习惯于快速消费声音和色彩,却不习惯需要耐心和集中精力的阅读,也不习惯需要时间而严密精确的思考。在这个快速信息的时代,用Google做检索器,每一个关键词都会带出大量信息,形成一种立体式的网络。可是这大量信息虽多却没有深度,虽广却不着边际,并没有太多相干或有用的资料。就像苏源熙所说,“传统文学批评那种细读和矛盾”在这种情形下,就“一定会显出是过

去时代信息贫乏的传播网络的迹象,而在那个时代,细节是需要注意的”。其实早在 1933 年,阿道斯·赫胥黎就已经说过“在一个变化迅速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信息灵通和有教养是互相排斥的两件事情。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很快阅读大量只是指南手册之类的书。而要有教养,就必须读比较少量的书,那是不同寻常地生活过、思考过、感觉过的人写成的书,这样的书必须慢慢读,并且慢慢地欣赏消化”。[③]阿道斯·赫胥黎确实预示了当前关于信息和真正的知识的辩论,但他认为只有少量男性作者写的书才值得一读这句话,又显然使他的见解显得落后过时了。赫胥黎现在很可能是一条巴斯奈特所谓“自由派人文主义史前时代的恐龙”,在今日的学院环境里,也很少听到他提倡慢慢阅读、获得教养那一类的话。无论如何,文学的确好像在淡出,文化研究逐渐取代了文学研究。而比较文学,即巴斯奈特以嘲弄口吻称之为“把文学当成普世性文明化力量的研究方法”,已经被宣告死亡了。[④]

可是所有那些宣告文学或比较文学已死的讣告,无论说得多么有戏剧性,当然都是虚假的,因为比较文学完全不理会这类威胁性的预言和警告,一直继续存在下去。有人认为比较文学已死的一个原因,也许在于比较文学,哪怕西方许多比较学者诚心诚意地努力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却至今仍然大致是一个局限于以欧洲或以西方为中心的学科。可是,文学研究可以做的一切,难道真的都已经做完了吗? 欧洲和北美的比较文学学者对西方以外文学传统里的重要作品,难道已经像对西方新的和老的经典那样熟悉了吗? 在这一点上,甚至在政治和思想意识上针对欧洲殖民主义而兴起的后殖民主义研究,也并没有真正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其批评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欧洲强权国家及其前殖民地之关系上,而现在这些国家之间除政治的关联之外,还有在语言上的关联。正如艾米莉·阿普特尔(Emily Apter)所说“甚至新形式的后殖民主义比较研究,由于继续了帝国时代不同语言的区域划分,无意间也就持续了新殖民主义的地缘政治”。她正是针对这种情形,特别提到阿兰·巴窦(Alain

Badiou)肯定性的努力,呼吁比较文学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在决不忽略后殖民地区文学的前提下,这种超越的努力呼吁比较文学要越过通常明显的纽带和关联,极力扩大其眼界和视野。在我看来,比较文学要进一步成长发展,就必须这样做。

我认为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就为比较文学扩大眼界和视野提供了很有潜力的新领域。著名的比较学者克劳蒂奥·纪廉(Claudio Guillén)并不专门研究中国或其他亚洲地区文学,但他却大力提倡东西方比较研究。纪廉认为,比较的空间不在国别文学领域,甚至不在国际的领域,而在超国别(supernational)的领域。这样一来,比较文学就脱离开国别文学及其间关系,也就避免了影响和受影响、中心和边缘、西方和非西方等等不平等关系的种种问题。比较文学一旦超越历史上的实际接触、文化上的类似、语言上的亲缘关系等等,在为大跨度比较提供基础方面,文学理论就变得特别重要。于是东西方研究就成为一个极有潜力的领域,"可以允许统一与多元之间的对话,而那又会刺激比较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批评或历史与理论之间公开的碰撞,或者说我们关于诗的知识——超国别诗的知识——与诗学理论之间的碰撞"。[⑤]

纪廉呼吁扩大比较文学的范围,超越他所谓"欧洲的或欧洲中心主义的沙文主义",同时雄心勃勃地提倡学习世界各国的语言和文学。阿兰·巴赛主张比较极不相同的文学作品,纪廉也早就提出类似看法,认为历史上毫无关联的作品之比较是"比较文学当中最有前途的趋向"[⑥]。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互不相干的文本拼凑起来,也不用去管是否有比较的基础。纪廉以理论上的可类比性来做比较的基础,而不是要求实证式的联系或历史上发生过的接触,因此他认为对于今日的比较文学而言,东西方研究就提供了"特别有价值和前途的机会"。[⑦]东西方研究能够赋予比较文学的不仅是新的生命力,而且是新的视角,从这个新视角看来,就可以暴露局部和地方式眼光的狭隘局限,同时拓展以新方式做比较的可能性,以及提出新问题的可能性,这

些新方式和新问题都会是一些挑战,但也就有得出新见解的可能。如果比较文学的确已准备好超越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包括后殖民主义的局限,那么东西方比较和世界文学研究就可能是进一步发展的希望。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把历史上没有联系的作品做大跨度的比较,绝不能只是把毫不相干的文本随便拼凑起来就算完事。当不必以历史上的关联来证明比较的合理性时,就必须以理论问题的类似来做比较的基础。我相信,纪廉所谓批评或历史与理论之间的碰撞,或者诗与诗学之间的碰撞,就是指理论问题应该成为比较研究的基础。恰恰因为东西方文学除了在近代历史中以外,并没有密切的联系,东西方研究就为以理论为基础的比较开辟了新的场地。不过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非西方文学广阔的领域难道只是一片处女地,等着学者们用美国大学里已经占据主导的同一套理论去开垦、去征服吗?当理论从一处地方旅行和转移到另一处时,它们将如何适应那变化的文化和政治环境呢?跨过语言、文化和政治的界限翻译概念和理论时,其中又会有怎样的转变甚或歪曲呢?一个理论概念又如何“在新的时间、地点的新位置上,在某种程度上被其新的用途所改变呢?”[8] 爱德华·赛义德在《旅行的理论》一文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过恰好是在东方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里,全盘机械地照搬西方理论,包括赛义德自己的理论,却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出东西方简单对立的问题,引发一股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一种赛义德自己觉得遗憾而且“努力去克服”的“反西方主义”。[9]

因此,比较文学真要越过欧洲和西方的界限,就必须对不同地区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历史和社会政治状况,都要有高度的敏感和深切的了解,这才是能够准确理解、成功比较的前提。我们最要避免的就是把西方理论简单套用到非西方文学的材料上去,比较的工作必须由下而上地建立起来,从任何文化和文学里都存在的基本材料、基本问题和人的基本经验开始,例如语言、表述、意义、理解和解释等等问题。只有用平

等的眼光，看理论问题如何从这些基本材料、问题和经验中产生，又如何在不同文化和文学中得到不同的表述，我们才有希望避免把西方理论简单套用于非西方，从而避免在理论的层次上，重复西方对东方的殖民。

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赞同苏源熙强调"文学性的语言学特性"，也赞同他注重原文、不愿依赖翻译的意见，因为这就把文学放回到我们注意的中心，也提醒我们在其独特的语言表述形式中来理解文学的重要。我基本上也赞同他另一个看法，即比较文学学者通常善于指出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似对应之处，"但在文学和理论的互动中，专家们往往否决他们的看法，又值得他们进一步反省"。专家否认或质疑比较学者的工作，是我们都太熟悉的情形，但这种情形并不完全由于专家有专科学问的严谨和对所讨论问题的深度了解，也还可能由于他们眼光局限、心胸狭隘。我们对此的回应应该是：比较学者也应该是一个专家，然而是一位兴趣、知识和眼光都广泛开阔得多的专家。

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比较学者对别的文化和文学知道得太多，就不可能仅仅满足于他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他见过汪洋大海，就不可能因为家乡有那条可以饮水的小河而欣然自喜。能够说别人的语言，读不止一种文学，可以说是比较学者决定性的特征，但那并不必然把比较的工作与翻译和主题学对立起来。苏源熙把主题学和简单罗列类似的作品等同起来，而且说"一旦用普遍性的眼光来看，类似的作品就永远也数不完"，我觉得这就把主题学研究说得未免太简单了。诚然"仅仅在不同地方发现同样的主题是不够的"，但真正称得上主题学的研究绝不只是把作品简单罗列起来点一番数，却可以是一种仔细的探索，力求达到作品的特殊性和不同作品之间关系的平衡，而且恰好可以做苏源熙认为理想的那种比较工作，即创造性地寻找不同作品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新的视角，超越专门家局限的眼界来阅读这些不同的文学作品。如果我们能富于想象地去阅读文学，能看出在不同文本和不同文学传统的碰撞中产生出来那些主题的变化和形状，我们就可以向专家显示

比较研究的成果,而那是从单一文本传统的角度无法得到的成果。在我看来,那就是我们这个学科有价值的很好的证明。

翻译是否只能传达主题内容颇可以再作商榷,不易翻译的是否就一定是文学作品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也大可以再讨论,不过我赞同苏源熙的意见,即任何文学传统中最伟大的诗人的语言都极为复杂精巧,而这种高度复杂精巧的语言往往成为一种障碍,使他们的作品难于翻译得当,不大可能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流通,受到国际读者的欣赏。例如中国古典文学中唐代的大诗人,首先在日本,后来在世界别的地方最知名的是白居易,而不是在中国本民族传统中最受敬重的杜甫。这当中的差异肯定和理解这两位诗人作品的难度有关。和杜甫比较起来,白居易显然更容易读,也更容易译。不过在这种情形下,我并不认为这就是翻译的失败,然后把整个问题都交到专家们手里去处理,我反而觉得这恰好是比较学者施展身手的机会,可以去探讨这些诗人作品里“文学性的语言学特性”,并且对这些作品在本民族传统之内和之外接受上的差异,作出最合理的解释。

在所有人文学科里,比较文学也许是最自觉意识到自己问题的一个学科,所以也好像总是处在某种危机之中,但是我并不赞成在随时质疑自己定位时那种悲观的态度,而且我也不相信,宣称比较文学不可能或已经死亡那一类耸人听闻的话,是真正出自内心的忧虑。我们的学科仍然有生命力的最好证明,就是去实际做比较的工作,而且把这工作做好。正是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之中,我们才不仅可以证明比较文学的价值,而且创造其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

注:

① See René Wellek,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58),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ed. Stephen G. Nichol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82 – 95.

②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1993), p. 5.

③ Aldous Huxley, *Texts and Pretexts: An Anthology with Commentaries*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3), intro. p. 3.

④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47, See also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tiy Press, 2003).

⑤ Claudio Guillé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s.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70—71.

⑥ 同上,第 86,87 页。

⑦ 同上,第 70 页。

⑧ Edward Said, "Traveling Theory," in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27.

⑨ Edward Said, "East lsn't East: The lmpending End of the Age of Orientalism,"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3 Feb. 1995); 又,我在拙著《走出文化的封闭圈》(北京三联书店,2004 年)里,也讨论过有关问题。另外还可参看苏源熙的有关讨论,见 Haun Saussy, "Postmodernism in China," in *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118—45.

新 书 架

《翻译家鲁迅》,王友贵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7 月。

对作为翻译家身份的鲁迅,在鲁迅研究史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王友贵的新著《翻译家鲁迅》,是从翻译家角度来研究鲁迅的一部专著。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作者将翻译家鲁迅放置在 20 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的大背景下,详细讨论了鲁迅先生的翻译活动、翻译作品、翻译思想、翻译路线和翻译实绩,论述了他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中外文学、文化交流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该论著还分析了鲁迅的翻译选择与其思想的发展、个人性情、审美倾向的关系,如"梦者鲁迅"、"浪漫的鲁迅"、"苦闷的鲁迅"、"童心的鲁迅"等,并提出了"鲁迅翻译模式"。

(学朴)